

# 向绿而行 “植绿”更要“护绿”

艾才国



3月10日上午,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开展第45年之际,全市近300名干部群众参加2026年春季义务植树活动,以实际行动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,为长江岸线添新绿、为生态安庆增底色。

(《安庆晚报》3月11日)

春风起,万物生。在我国第48个植树节来临之际,宣城大地处处涌动着植树造林热潮。从城区到乡村,从机关到校园,从干部到群众,各地陆续开展植树造林活动,为建设美丽安庆增绿添彩。

毋庸置疑,植“绿”造“绿”、植树造林,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、功在千秋的好事。但有的地方植树季节一过,树虽然种了许多,但树木成活率低,造成了“年年植树不见树,岁岁造林难见林”的局面,形成了“年年植,年年死;年年死,年年植”的怪象,造成了经济浪费,也带来了社会的负面影响。

究其原因,不少人思想上有误差,重“植”轻“管”,重数量轻质量,监管部门考核时只考核“造绿”造出了多少,而树木成活了多少,却无人问津。甚至个别单位将植“绿”造“绿”当成了一



3月10日,迎江区长风镇安广江堤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。

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

场“种植秀”,植树现场,热火朝天,人山人海,战果显著,持之以恒的管理、配套后续措施便“不见踪影”。

其实,与简单的植树造“绿”相比,管护才是更高层次的“爱绿”,正所谓:“三分栽,七分管”,既要科学地栽,依据土壤、气候特点科学选种树木;更要严格地管,实行包栽树、包成活、包管理、包成林的管理责任制,如此,才能栽一棵,活一棵;栽一片,绿一片。此外,还要强化全体公民种绿、护

绿、爱绿、守绿意识,不随意破坏树木,全社会都来栽树、护树,如此,何愁宣城大地不越来越绿、越来越美?

春来一丝绿,秋来一片林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,也是植树造林的大好契机,各地热火朝天的春季义务种树活动正如火如荼展开,期待在“植绿”之后精心谋划一下“护绿”工作,一起行动起来,向绿而行、“植”此青绿,共同播种一抹绿色,为建设美丽中国添砖加瓦。

## 别让AI“投喂”废了孩子的思考能力

王小梅

3月10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接受采访时说,青少年过于依赖AI会出现很多问题,除了有损视力,还会阻碍思维、创造力、想象力发展,应该尽可能避免学生过早使用AI。(《中国新闻网》3月10日)

“该记的记、该背的背,否则会变‘傻’的。”全国人大代表陈众议在今年两会上的这句大实话,无意中击中了无数家长内心的隐忧。既然AI什么都会,孩子还该学什么?还有必要死记硬背吗?

这个问题的答案,其实就藏在“该记的记、该背的背”的建议里。这并非固执于旧时代的戒尺,而是对大脑发育规律的敬畏。人的大脑就像肌肉,不用则废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,过度依赖AI助手完成论文的学生,大脑活跃度显著降低,表现为神经连接减少、记忆检索能力退化。当孩子遇到难题的第一反应是“拍照搜题”而非独立思考,表面是省了时间,实则是把本该属于大脑的“思维体操”外包给了机器。

或许有人会说,这是杞人忧天,技术进步本该把人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。可问题在于,青少年的成长有其不可逾越的生理规律。有专家指出,长期依赖大语言模型可能重塑大脑神经回路,负责信息整合、记忆强化的关键网络甚至会逐渐退化。我们常说“脑子越用越灵”,反过来也成立——脑子不用,真的会“生锈”。陈众议代表建议效仿一些国家的做法,不允许青少年带手机、iPad入校,看似是“一刀切”的硬隔离,实则是给孩子的精神世界留白。就像那位有心的家长观察到的,身边那些坚持阅读、勤于思考的人,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拥有真正的健康和核心竞争力。

更深一层看,避免孩子过早沉溺AI,不仅仅是保护视力或分数,更是捍卫他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结。有调查数据显示,超过两成未成年人倾向于“只和AI聊天,不愿与真人交流”。冰冷的算法可以模拟,却无法给予真实拥抱;能输出标准答案,却教不会孩子如何在争吵后握手言和。如果少年时代就习惯了AI的“逢迎”与“顺从”,未来又该如何面对人生的复杂与人心的微妙?

技术的浪潮挡不住,也不必挡。但教育的本质,从来不是让孩子跑得更快,而是让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中,始终保有感知风的方向、思考路的崎岖的能力。在AI“投喂”触手可及的今天,允许孩子放下屏幕,去记、去背、去发呆、去犯错,或许正是我们能给他们的最奢侈的礼物。毕竟,人生这场长跑,最关键的几步,还得靠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迈出去。

## 彩礼“限价”,能否让“利”回归“礼”?

关育兵

2026年全国两会,“高额彩礼”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提出,可制定彩礼限额,建议不超过6万元,并对低彩礼家庭给予创业、就业激励。全国人大代表张强则分享了农村彩礼不超2万元的基层探索案例。话题迅速冲上热搜,折射出公众对这一社会顽疾的深切焦虑。

(《中新网》3月4日)

事实上,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近年来第七次点名整治农村高额彩礼。从“天价彩礼”到“因婚致贫”,为何这一议题屡屡进入政策视野与舆论核心?

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的民间习俗,而是多重社会矛盾交织的产物。在不少农村地区,攀比之风让彩礼沦为“面子竞赛”的标尺;性别结构失衡加剧了婚恋市场的博弈;部分家庭甚至将彩礼视为养老保障或兄弟婚嫁的“周转资金”。其结果是,“光棍村”与“高

价姑娘”并存,婚姻被异化为沉重的经济契约。当彩礼从“礼”走向“利”,再从“利”异化为“赌”,治理便成为必然。

那么,设定彩礼“上限”,是否就是破解困局的“金钥匙”?

从实践看,标准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。山西运城盐湖区出台指导意见,明确彩礼原则上不超过6万元;甘肃肃南县推行“倡导性标准”,让低彩礼渐成新风。这些探索证明,明确的“限高令”有助于打破“价格内卷”的囚徒困境,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依据。

然而,争议同样不容回避。首先,彩礼在法律上属于自愿赠与,若公权力强制定价,不仅缺乏法律依据,还可能催生“改口费”“下车钱”等变相名目,让治理陷入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的尴尬。其次,“一刀切”的标准难以适配各地千差万别的经济水平,强行统一反而可能脱离实际。再者,基层执行成本高昂,若每桩婚事都要“留痕监管”,难免流于形式。

可见,彩礼治理是一场需要“软硬兼施”的系统工程。既要有限度的“硬约束”,更要有观念的“软浸润”。一方面,可以通过村规民约、红白理事会等基层自治形式,将倡导性标准内化为民间自觉;另一方面,更要从根源上削减彩礼的“功能负载”——完善农村养老保障,让父母不再视彩礼为“养命钱”;发展乡村产业,让年轻人增收有门,婚姻不必捆绑“价格补偿”;推进性别平等,从长远上缓解婚恋市场的结构性矛盾。

说到底,彩礼本应是“两性之好”的见证,不该成为压垮家庭的“大山”。让婚俗回归“礼”的本质,既需要制度“限高”的勇气,更需要观念“深耕”的耐心,以及社会系统治理的定力。当“低彩礼光荣、高彩礼可耻”真正成为社会共识,当年轻人不必为一场婚礼耗尽两代人的积蓄,我们或许才能真正说,这场治理正在走向胜利。